

陆定一

茗边老话

光明日

F120

57

3

茗边老话

陆定一

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

(北京永安路10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第二医学院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1.875印张 32千字

1985年8月第一版 1985年8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4,900册

统一书号：3263·027 定价：0.40元



作者照

胡耀邦、陈云、叶剑英同志在党的
十二大期间与作者（右二）在一起。



邓颖超、宋任穷同志与作者（右）在一起。

出 版 说 明

《茗边老话》是陆定一同志谈学习《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的体会的结集。作者联系中国共产党几十年的奋斗历程，以个人的亲身体验，谈了中央决定中的一些重要思想，既讲了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基本理论问题和党的历史上的经验教训，又联系现实，针砭时弊。

《茗边老话》在《光明日报》连载后，受到读者的欢迎，认为是“老话有新意，既往又开来”。不少读者要求出版专集。现在出版这个集子，就是为了满足读者的这一要求。

为使读者更深刻地了解党的历史经验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特将陆定一同志一九八三年十二月发表在《光明日报》上的文章《用毛泽东思想做好整党工作——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九十周年》附录于后。

目 录

一、读三遍.....	(1)
二、资本主义的经营管理方法要不要学? 怎样学?	(3)
三、关于不要戴政治帽子.....	(7)
四、关于不要戴政治帽子 (续)	(10)
五、极为宝贵的经验.....	(14)
六、事业成败之所系.....	(16)
七、事业成败之所系 (续)	(20)
八、企业的活力来自主人翁.....	(23)
九、战时经济与平时经济.....	(26)
十、战时经济与平时经济 (续)	(30)
十一、关于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	(33)
附录：用毛泽东思想做好整党工作	
一一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九十周年.....	(36)

读 三 遍

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一个很好的《决定》。这个《决定》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纲领，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我们应当认真学习。

我们党从八大提出经济建设已经二十八年了。那时候，对到底怎样搞经济建设，还不懂，还没有理论上的认识。一九五七年，毛泽东同志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里，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并还指出有一部分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不适应，有一部分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不适应，阻碍着生产力的发展，要解决。毛泽东同志这些话是对的。但究竟哪些地方不适应，并不清楚。毛泽东同志的错误，就在于他后来认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乃是阶级矛盾。先是用压指标的办法搞“大跃进”。

“大跃进”不成功。他用列宁的一句话“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作为教条，推论出我国已经出了一个新的资产阶级，“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简称“走资派”。他索性搞了一个“文化大革命”，用“一个阶级打倒一个阶级”的办法来解决矛盾，并且说，今后“文化大革命”要每七、八年搞一次。结果搞乱了。

十一届三中全会恢复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把思想搞对头了。党中央认识到，基本矛盾在于经济体制的僵化，阻碍着生产力的发展。接着，对农村经济体制进行了重大改革，实行了“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十二大又提出建设“两个文明”、“对内搞活、对外开放等等。这些方针、政策都是正确的，对经济发展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但是，由于当时的条件所限，很多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譬如：如何认识商品经济、价值规律；如何改革计划体制、价格体系、劳动工资制度；对资本主义，学它什么，不要它什么；等等。这次会议把所有问题都集中起来，梳了辫子，归纳为十条，给以系统的解决。有些问题是已经解决了的，《决定》加以肯定；更多的问题是已经提出来了，尚未得到明确解决的，《决定》提出了解决的原则，还有些是应该做而没有做的事，《决定》也把它提出来了。这样就有了一个纲领，它标志着我们党在经济建设方面基本成熟了。

从这个《决定》，使我回想起毛泽东同志《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书。“战略问题”系统地解决了革命中的最关键的问题。《决定》系统地解决了

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的最关键的问题。

以前，中央开重要会议，发重要文件，大家都要表态。这次强调不要搞表态，要认真学习，我认为这样做很好。究竟如何学习好？我主张先把《决定》细读三遍。第一遍，只能是浏览，了解大概。第三遍，才能有心得。底子打好了，再读时就可以仔细推敲了。这样，讨论起来才能言之有物，不是离题万里，夸夸其谈。有些同志喜欢提出“要吃透”，实际上吃不透。马克思主义有很多东西，我们学了几十年，至今还不能说吃透。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要搞很长的时间，前面的路还长着呢。过去，林彪、“四人帮”把学习风气搞坏了，庸俗化、简单化，不能启发人们的思想。我只提倡先学三遍，然后自己要学就再学，不要求人人“吃透”，让大家在学习中发挥自己的主动性、积极性、创造性。这种学习方法，不妨试试。

资本主义的经营管理方法

要不要学？怎样学？

《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中有这样一句话：“为了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必须认真总结我国的历史经验，认真研究我国

经济的实际状况和发展要求，同时必须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管理方法。”

从“同时”起到句末有近五十个字，不大好懂。

先要知道什么是“社会化生产”。“社会化生产”，是到资本主义社会才有的，起初是把各种手工艺工人集中在工厂里，用一个动力转动许多机器的生产，后来实现了分工、协作、专业化、自动化。这同手工工人的个体生产和手工业作坊的生产不一样，是一个大进步。

在资本主义社会，一个是生产社会化，一个是生产资料私有制，二者之间发生矛盾，成为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由此发生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阶级斗争、侵略战争。最后的结局，是资本主义制度必然要被社会主义制度所代替。我们反对资本主义，是反对它的所有制，并不而且从来不反对生产社会化。我们实行的是生产资料社会主义公有制，在这种制度下面还要实行生产的社会化。只要是反映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管理方法，我们都要学习和借鉴。我们长期从事革命，对资本主义剥削制度深恶痛绝，但是如果以为连资本主义社会里的社会化生产也要反对，那就错了。“文化大革命”时期，全盘否定一切，甚至把生产和对生产的管理也当作“资本主义”来反对，什么“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

苗”，“宁要社会主义的晚点，不要资本主义的正点”，荒唐透顶。我们的经济是落后的，所以一定要学习社会化生产，学习对社会化生产的先进的管理方法，这样才能迎头赶上。

究竟资本主义哪些东西可以学，哪些东西不能学？这就要具体分析。我只举几个例子，供大家参考。二十年代末，苏联曾经对“泰罗制”发生过争论。有人认为这是资本主义剥削工人的狠毒办法，不能学。列宁则全面评价了“泰罗制”，说它“一方面是资本主义剥削的最巧妙的残酷手段，另一方面是一系列的最丰富的科学成就。”（《列宁选集》第3卷511页）后来，苏共中央认为，社会主义社会已经消灭了资本主义的剥削制度，用科学的管理方法可以提高生产力，所以只有好处，没有坏处。六十年代，有些资本主义国家提出“高生产、高消费”，我们学不学呢？这要结合我们的国情具体分析。高生产、我们目前还达不到，但应该学，尽力提高生产；消费，我们要随着生产的发展适当提高，这样可以促进生产。资本主义国家提出的信息社会，是资本家阶级相互之间激烈竞争的产物。但这也是科学的成就，我们一定要努力去学，因为我们的信息不灵通，不发达。实现四个现代化，信息不灵通是不行的。日本企业管理中有一条办法，就是资本家、厂长、经理可以“发红包”，秘密地给工人发奖金。我看这个办法对我们不

完全适合。因为我们的企业不是私人所有的，工资、奖金，没有必要向职工保密。但企业的厂长、经理，应当有发奖金的决定权，对于有贡献的职工，给予重奖，有利于鼓励先进，鞭策落后。

在经济体制改革中，我们既要学习人家一些好的东西，也要保留和发展我们自己一些好的东西，这才是正确的态度。现在，我们有些好东西，资本家也在学呢。例如，有些资本家，对本厂工人的婚丧喜庆、生老病死，表示关心，而且做得细致。当然，他们这样做，并不改变资本主义社会的性质，犹如我们学他们的先进经营管理方法，并不改变社会主义的性质一样。

经过社会主义革命的国家，要恢复资本主义制度，如果不是不可能，也是难乎其难的。这已经由历史作了证明了。十年“文化大革命”一个“走资派”也找不出来。厂主里面出社会主义者，倒是有的，英国的空想社会主义者欧文就是。恩格斯是共产主义者，更是大家所知道的。他们当然只是个别的人。

关于不要戴政治帽子

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第十条中说：“对于在改革中出现的偏差和错误，除了严重违法乱纪者必须依法处理外，都要采取疏导的方针，批评教育帮助的方针，而不要戴政治帽子。”这是关于党内生活的一条极为重要的规定。虽然只有一句话，却是党六十多年经验的结晶。

我们的党，是实行民主集中制的党。它有广泛的民主，在这个基础上建立起了高度的集中。我是一九二五年入党的。入党的时候，党内生活是正常的，心情很愉快。同志之间亲密无间，无话不谈，上自政治，下至个人问题，有许多话对家人，对亲人不能谈，同志之间可以毫无顾忌地谈。我是知识分子出身，思想上相信共产主义，但还有许多错误的思想。在党内经过同志之间的切磋琢磨，觉得自己慢慢成熟起来。

一九二六年，我认识了瞿秋白同志。他告诉我，党内在一些根本问题上有分歧。我这才闻所未闻，知道党内还有斗争。党内第一次的斗争，是同陈独秀右倾路线的斗争。当时，有一批党员如陈独秀、彭述之

等，明明有右倾错误，但不肯改，而且实行家长制。陈独秀对国民党右派一味退让，廖仲恺被刺，蒋介石搞“中山舰事件”，他不让动员群众反对。陈独秀对农民运动和发展革命武装的工作采取消极态度，对工人和群众的自发的过左行动（如武汉的罢工，儿童团剪长衫），一味斥责，不去劝说他们、开导他们，挫伤了他们的革命积极性，并使他们莫知所从。陈独秀明知蒋介石已经反革命，汪精卫将要反革命，却不告诉党员提高警惕。这一切，都来源于他的思想。他认为民主革命应当让资产阶级领导，共产党只应领导社会主义革命，不应领导民主革命。其实列宁早就讲了，无产阶级应当领导民主革命，并且把它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列宁的《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一书，就是讲的这个问题。陈独秀的领导，使革命不可避免地遭到失败。要革命，要取得革命的胜利，就非在党内进行斗争不可了。那时，斗争的方法是文明的、健康的。在党的会议上你讲你的，我讲我的，各抒己见，没有谁围攻谁。后来陈独秀在武汉国民政府快要叛变的紧要关头，“攒了纱帽”，不干总书记的工作，离开了中央，最后加入托派，那是他自己的事，并没有人压他、逼他、撤他的职。

陈独秀自己不干总书记，但党不可一日无中央。这时出来收拾局面的，是瞿秋白、李维汉等在中央工作的同志。当时组织了中央五人小组，得到共产国际

代表的支持，召开了“八七”会议。“八七”会议对中国革命有重大意义，也因为党还幼稚而有错误，这里，不去讲它。“八七”会议对事不对人，对陈独秀连指名的批评也没有，党还是希望他自己觉悟。

“八七”会议以后，党的生活恢复了正常，但又出了“新鲜”的事。南昌起义失败，周恩来同志被处分。广州起义失败，叶挺同志被处分。湖南农民起义没有夺取大城市，毛泽东同志被处分。这些处分都是国际代表提出来，中央照办的。秦用孟明而兴，楚杀子玉而一蹶不振，两千年前就有这个经验了。我们的办法类似“楚杀子玉”。当时我觉得非常奇怪，但又幼稚到这个程度，以为“共产国际究竟与众不同，共产国际想必一定是对的”。迷信是幼稚的产物。我对共产国际的迷信，到遵义会议才有所改变，从一九二五年到一九三五年，前后达十年之久。

以上是建党初期的一些情况，那时党内生活基本上是正常的。反对陈独秀的斗争是一次政治斗争。尽管是政治斗争，也是可以健全地进行的。就我个人的想法来说，也有点“后悔”。如果这个斗争进行得早一点，说不定可以挽救革命。客观的事实是，我们栽了跟头，而且以后也还栽了跟头。党不成熟，革命是不会胜利的，胜利了也是不能巩固的。成熟就需要经验，需要学习，因而需要时间。

以后的事情，下次再谈。

关于不要戴政治帽子（续）

李立三的家长制，同陈独秀的家长制不同之处，是加了一个处分干部。陈独秀拒绝听取不同意见，李立三对不同意他的意见（全国暴动）的同志，如恽代英同志，给予降职的处分。

在共产党内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是从王明开始的。只要不同意王明的意见，就是反对“国际路线”，就是“路线问题”，就是“反党”。反党就是反对革命，反对革命就是反革命。斗争要残酷，打击要无情。先是批判，然后就关起来审查，然后就刑讯逼供。供了的当反革命分子处理，不供的是态度恶劣，也成了反革命分子。然后就处决，就株连许多人。意见不同、不光是政治意见，而且包括思想、宣传、军事、经济、文化、科学等等各种意见在内，都是政治问题，都戴政治帽子。凡是诬告，都算真的，诬告者提升，被诬告的受审查，受处分。有的人并无反对的意见，但只要王明、康生“看不顺眼”，都要想方设法除掉。在王明看来，凡是老干部，都是“机会主义者”，不是“右倾机会主义者”，就是“‘左’

倾机会主义者”。“‘左’倾来自右倾”，所以李立三的“全国暴动，是右而不是左’”，谁要说李立三“左”了，那就是“调和路线”。等等，等等。这样做才叫“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即比布尔什维克还要布尔什维克，似乎只有他们才能领导革命达到胜利。王明路线统治了四年，党员之间的关系，从亲密团结变成互相戒备，“乌鸡白眼”。民主没有了，人人自危。

王明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是从哪里来的？这不是王明的发明，是从外国搬来的。叫做“国际路线”。当然，王明搞这一套是有他的野心的。

王明是有“理论”的。他的理论，主要的是列宁《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一书中只符合俄国的实际，但不符合中国实际的那一部分，再加上其他一些不符合中国实际的教条，所以叫做教条主义。列宁的“两种策略”，主张共产党应该领导民主革命，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对中国革命也是适用的，反对陈独秀主义，我们就是用的这个理论。还有，列宁指出，民主革命最重要的内容，是土地革命，这对我们也是重要的。但是，“两种策略”符合俄国的实际，其中有许多并不符合中国的实际。举其大者来说，一是阶级分析，俄国是三个主要阶级，即地主阶级、资产阶级、无产阶级；中国受帝国主义侵略，因而资产阶级就分为买办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